

## 適當發展在地人的「全球性」能力

◎曾熾芬

我這部分的與談內容將先釐清全球化的內涵，主要討論企業與地方的關係。然後，在這樣的認識之下，我希望進而討論一般人作為勞動者的困境，以及公共資源可以提供的一些出路。

### 跨國公司不需長期經營的基地？

王院長引言部分談到全球化對台灣的衝擊，著重於討論資本跨國化的現象，他指出因為一九九〇年代全球與區域經濟的轉變，台灣企業以及產業中與國際代工體系最相關的部

門在考慮市場、人員調度、運作單位的配置時，經常將好幾個國家的地點考慮進來，同時，零件、原料、半成品、成品也不斷地在不同區域間調度與重組。簡言之，在這樣的全球化過程，正在進行的其實是企業的「去地域化」(de-localization)，也就是企業並不會「依賴」特定的空間，企業說走就會走。在這樣的描述中，企業可以基業長青，但卻不需要持續在特定的泥土上經營；它們既沒有「祖國」，也沒有「他鄉」。

如果這個描述是對的話，那麼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那堅定的等號，勢必開始動搖。曾任通用汽車總裁的Charles Wilson說過：「對通用汽車有利的，對美國也必然有利。」那樣的宣稱，在全球化的今天，勢必遭到嚴重的質疑。

許多條件的變化固然使得企業國際化的障礙大為消除，不過，究竟資本有多麼地不需要特定地域、尤其不需要母國作為某種意義之下的基地 (base)，仍有許多值得澄清的地方。許多研究指出跨國公司並不像一般認為的那樣無國界；譬如Paul Hirst在《全球化迷思》這本書中即指出，即便是全球前一百大跨國公司，它們的管理型態以及執行董事會仍然非常有本國人特色，它們的研究發展大多在母國進行，融資活動也以母國為基地。企業與資本並不如一般所認為的會輕易地放棄它們在母國、特定地域地所經營的成果，畢竟各種資源的運用，仍然非常植根於在特定國家長期的經營與瞭解。企業在全球化過程中與母

國、與特定地方的關係，必須繼續被仔細地研究，因為這樣的瞭解將牽動許多政策制訂的考量。

### 在全球化脈絡中發展「企業公民身分」

企業如果不是真的可以輕易離開一國、一地，而必須與母國或特定地方保持關係，則在全球化的脈絡中，「企業公民身分」(corporate citizenship) 就還有可能再予以強調、發展的空間。企業的公民身分指的是，企業也是政治社群的組成份子，這是一項極容易被忽略的事實，這也是為什麼「企業公民身分」成為一種需要被推動的理念；這個理念的內涵是：商業組織除了對它的股東有經濟與財務責任之外，對於它營運所在的社區亦負有社會、文化與環境的責任。一個企業接受其公民身分，意味著這個組織必須做各種調整，以便加強組織成就與社區繁榮之間的正向相關，這樣的理念並非高調，它非常反映現實。畢竟，不論在多麼全球化的今天，大部分企業依賴國家或區域市場，也非常依賴該國、該地能提供的人力素質，這樣的依賴如果被正確點出，企業與地方的關係並不一定朝著愈來愈鬆散的方向發展。

## 在地勞動力是國民經濟的主體

全球化對於個人的經濟機會影響究竟是什麼？困局是什麼？出路何在？一直比較受到忽略。在柯林頓主政時期擔任勞工部長的Robert Reich，他因應美國企業對外投資增加並帶走許多工作機會，因而導致的失業問題時，提出一些非常值得我們目前參考的論點。他認為政府面對這樣的變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不斷地提升工作者的素質以吸引投資者前來。對此，他提出以下的想法：「誰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那些無法在全世界流動的工作者。對於美國未來的挑戰——對許多其他國家也一樣——是如何增加其公民參與全球經濟的價值，而這須透過加強他們的技術與能力，以便於他們與世界市場連結。」

低工資的追逐曾經帶動戰後資金跨國流動，在新一波的資本跨國化中，對較先進的工業資本部門而言，工資成本佔總成本的比例已經在縮減。因此，資本尋找的重點是高的勞動生產力，而非低工資。因此，我們應該更著重投資於培養好的勞動力，而非繼續用各種低工資、忽視勞動條件、賦稅優惠等條件來吸引資本的投資。我們可以將當代的許多企業，不論是本國或外國，都視為跨區域的企業（或跨國企業只是其中一種），哪裡有比較利益它們就會被吸引到哪裡投資。在不斷翻新的經濟活動中，勞動力素質作為一種比較利益

的重要項目，卻是不變的事實。所以，Reich才認為，面對千變萬化的經濟環境以及全球化的挑戰，提升公民勞動力的素質，正是以不變應萬變的根本之道。繼續增加對國民教育與技術訓練的投資，使得本國勞動力的品質不斷地提升，自然會吸引本國企業繼續在台灣投資，這也會讓「根留台灣」這樣的訴求，從道德性的呼籲轉變成為實際可行的路徑。

## 公共資源須介入提供勞動競爭力

當愈來愈多的工作者必須與外國人口在同一勞動力市場競爭時，公共資源必須介入提高勞動者的全球競爭力。如果公共教育體系的提供不足，每個人的競爭力將更加取決於個人的社會階級資源，世代間與世代內的階級向上流動勢必更為困難。因此，若要避免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平等，公共資源應該積極介入提供各種在全球化與新經濟活動之下必須具備的知識與技能。許多非英語國家長年以義務教育的資源，教導國民英語，使得英語成為一種普遍的能力，而不是特殊階級才擁有的人力資本，成效卓著，值得我們加緊學習。

在外國語言教育實施過程中，反對的聲浪經常持著「在地語言受到威脅」的論點。但是，當菁英已經不再受限於「在地性」並逐漸以取得「全球性」為競爭優勢時，公共教育

體系如仍受囿於「在地性」的範圍，使得只能依靠公共教育資源的人，無法在跨越國界的勞動力市場中競爭，菁英以及一般人之間距離只會繼續拉大，這是社會學家 Zygmunt Bauman 的觀點。他是這樣說：「我們當中的某些人確實變成了完全真實的『全球人』；有些人卻被盯牢在他們的『在地性』上——在一個全球化世界中維持在地性，代表一種社會剝奪與落後。一邊是日益全球化與超地域的菁英，另一邊則是加倍在地化的其他人。」這樣的論點將在地化視為全球化時代的一個詛咒，而非資產，容或過於偏激，但其中卻有一項重要的訊息，那就是：在全球化時代，要邁向公義的社會，必須要適當發展在地人的「全球性」能力。